

# 新闻研究资料

(总第 55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主 编 孙旭培

副主编 阎焕书

## 新 闻 研 究 资 料

(总第55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编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国外总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北京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 7印张 160,000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04-1069-7/C·27 定价：2.50元

# 目 录

所谓“党性与人民性”之议和争……………汪文风（1）

## · 调研报告

浙江省城乡受众接触新闻媒介行为与现代

观念的相关性研究……………闵大洪 陈崇山（14）

大众传播对儿童的社会化和

观念现代化的影响……………卜 卫（47）

## · 理论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论舆论的力量和对舆论的控制

……………陈力丹（73）

## · 国外及港台新闻界

理想与现实之间

——西方新闻自由评析……………辛文法（90）

## · 中国报刊史

记《新华日报》（华中版）……………严 锋（105）

早期香港传媒与国家民族意识……〔新加坡〕卓南生（112）

清末10年官报活动概貌……………李斯颐（127）

## 一份颇具影响的外商华文晚报

- 《大美晚报》……………王欣(145)  
《美洲华侨日报》的创建和发展……………王士谷(157)  
北平沦陷后的敌伪报纸……………黄河(172)

### · 人物篇

- 范长江的新闻生涯……………邓焯焯(177)  
胡道静先生的报人生涯……………姚福申(190)  
绉弩在重庆……………陈落(204)

### · 广播与电视

- 解放初期广播广告概况……………袁军(209)

### · 考证补遗

#### 一封未寄出的信

- 对陈翰伯同志回忆录的几点订正……………陈理源(214)

### · 补白

- 1991年我国报业结构简况(46) 1991年报纸增版增期  
成为热点(89) 报纸编校质量抽查评比活动(104) 我  
国已建立近20家出版基金(156)

## 所谓“党性与人民性”之议和争\*

我们谈到党性，专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其实，资产阶级政党，小资产阶级政党，封建阶级政党，包括英国16世纪的托利党、辉格党，也都有他们的党性，也都代表着当时封建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只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诚如他们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来掩盖他们剥削阶级的实质一样，他们也用各种各样的名目，把政党的阶级实质掩盖起来，标榜他们的政党，似乎是代表着不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利益的，以此来欺骗世人，蛊惑人心。实际上，他们在内场人当中，还是说“我们工商业者（资产阶级）怎样”，“我们钢铁企业家（钢铁垄断资产阶级集团）怎样”，“我们石油企业家（石油垄断资产阶级集团）怎样”，他们的阶级性和资产阶级某个集团的利益的代表者的立场是很鲜明的。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能够理直气壮的、公开鲜明的宣扬

---

\* 本文为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组长汪文风同志于1991年6月28日在新闻所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 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汪文风同志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北京《光明日报》从事新闻工作，此次将文稿交由本刊发表，本刊表示感谢。——编者

我们的党性，我们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因为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最有远见，我们看到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的发展有了剩余生产物，必然解体，达到奴隶制社会，尽管这个发展是极其残酷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进步，然后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且看到逐渐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到来，及无比美好、无比瑰丽的共产主义曙光的出现。我们是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规律的。大公无私，无产阶级只有解放（经济上、政治上、旧的因袭在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有了前面两条，我们就光明磊落地斗争不息，奋斗不止。无产阶级的党性反映在组织上，即是团结成一个整体，为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的未来，形成铁的纪律。这种铁的纪律是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自觉遵守和组织约束相结合来维系的。

在民族解放斗争、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在长远的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总体来说，无产阶级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谁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呢？当然是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每个革命时期的斗争纲领，这些斗争纲领成为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纲领；而且共产党员身体力行地执行了这些纲领，团结人民群众，使党的纲领得以实现。我们党提出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纲领，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心愿，从而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斗争；我们党提出的联合各阶级、各民族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纲领，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以后又赶走了企图霸占中国市场

和领海领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军队；我们党提出的变国民党政权顽固坚持内战、坚持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战争为人民解放战争的纲领，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所有爱国人士的拥护，夺取了政权，并进而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所有这些阶段，从总体上说，党性和人民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融合在一起的，党的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党性，反映了人民性；人民性，完全为党性所代表。过去，我们说我们原来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经过几十年战争的摧残，已经是千疮百孔，比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要差三、四百年的时间。但由于我们是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发展的速度上我们可以用较短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个结论一般来说是对的，并且被我们建设发展的速度所证明。但是，在后来，在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之后，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担任中央领导工作的同志，产生了不冷静，急躁，冒进，以致做了一些违反规律的事情。我们有的缺点错误，是属于事物在发展中正常性的情况下产生的主观与客观需要逐渐达到统一，是任何政党、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避免的；有的是好心办了坏事，我们1949年10月方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真正完成反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这个原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历史任务，还延续了四五年，我们急于争取尽快赶上世界先进发达国家，望之过殷则造成操之过急，揠苗助长，欲速不达，1958年的大跃进因此垮了下来；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样全面性的、延续时间较长的错误，则不能说不联系到某

些领导同志头脑里存在旧的因袭了，这就造成了党的指导思想或者为追逐人民群众长远的利益而损害了人民群众当前的利益，或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然则，我们党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所犯的任何错误，与在阶级剥削、阶级压迫下剥削阶级鱼肉人民、镇压人民，毕竟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关于人民性的问题，一般见诸于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著作或艺术作品的评价。不管什么样的人民性，在以地主阶级统治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在以资产阶级统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总之，在一切存在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它只能是如夜幕重重笼罩下的流萤，只能是星星点点的，点点滴滴的，长期不见真面貌偶尔出现的，而且往往不是直接反映出来而是曲射、折射出来的。譬如说一场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人民暴动、改朝换代及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初，新的封建统治者或新当政的某个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为了安抚人民，不得不在他们的施政纲领中反映一些人民的意愿、要求和利益，再譬如说某个历史的、文学的著作家，由于自己遭受到某种迫害或者不幸，接触了人民，了解到一点人民的疾苦和愿望，在作品中反映了他们。前者，多属于一曝即逝，因为照顾人民利益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到新的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利益；后者，多数是通过一个罹难者的遭遇，一个不幸的妇女的苦难，或者假借神鬼蛇狐来述说短长的，甚至在说了短长以后，公然的劝世之文仍然是封建的道德、资产阶级的理论。即使如此，作者及其全家仍然可能遭到灭顶之灾、诛族之害。



随着叫嚷人民性而并存的，是所谓要办民营报纸、同仁报纸之议。重庆，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和解放战争的初期，是国民党政权的陪都，那里也曾掀起过一阵要搞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涟漪，报纸多得很，据统计，在抗日时期，全国有二百多种报刊，重庆就有一百多种。当时，国民党的党报是《中央日报》，共产党的党报是《新华日报》，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是《民主报》，国民党军队的报纸《扫荡日报》（后改《和平日报》），还有国民党特务办来故意淆乱视听的《新华时报》、《民主日报》。除此之外，有颇多号称“民营”的报纸，但据我所知，凡是“民营”的报纸，都是有国民党作后台的，譬如《大公报》，其主持人胡政之、张季鸾，是受国民党政学系左右的；《世界日报》，其主持人成舍我、陈云阁，是受国民党CC系左右的；《国民公报》是受国民党地方派曾通一、经济大亨康心之、康心如以及张群等左右的；《时事新报》是孔祥熙办的；《益世报》是天主教亲蒋介石政权的于斌办的；《商务日报》的社长高允斌是三青团的干事长。问题很简单，办报纸一要有钱，二要有势，有人支持，它还必须主要用国民党中央社发的电讯稿。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它的主导舆论只能是它那个阶级的舆论，哪来什么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民营”？！现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有人提出办“民营”报纸，说“民营”报纸才能反映什么“人民性”，其用意无非在：一、把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所领导的报刊，与剥削阶级统治下的官办报刊等同起来，实质上是要否定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二、把本来可以在各种小组会议、讨论会上所议论的、争辩的事，甚至把茶楼酒馆的道听途说，都抬在报纸刊物上

来，搞乱人们的思想，制造各种政治动乱，人身攻讦，从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三、实际上，是要继承“文革”各种造反小报满天飞的局面，使形形色色的野心家、阴谋家、心怀不满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都得以一展蛊惑人心的惯技，制造混乱，乱中夺权。诚然，过去在重庆的“民营”报纸中，由于有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参加工作，在报纸的某篇报道中，在某个记者写的某篇通讯中，尤其是不大被达官贵人们看得起的报屁股（副刊）上，有时会出现一些反映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反内战、反饥饿，反对美军帮助蒋介石运部队打内战的东西，但那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报纸的主要舆论，只能是暗夜里的流萤，黑楼森森里的一支微弱的烛光，而且是稍显即逝的，编辑、记者还随时会受到投狱、杀头、进渣滓洞、白公馆等集中营的威胁。号称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怎么样呢？报纸除了在垄断资产阶级的几个财团的卵翼下依仗各方的力量相互攻讦打得热闹之外，一般的记者、编辑人员出了他们的大格，轻则砸破饭碗，去填补失业大军的无穷无尽的队伍，重则锒铛入狱。黑社会势力本来就是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在军队、政府、法庭、监狱之外的另一支镇压力量。黑社会势力是剥削阶级统治者的一个既爱又憎、又拒又亲、刁钻凶恶的情妇，剥削阶级统治者对她是既即又离，不即不离，用其公开的镇压所不能达到之所能，憎其往往也会超出其法统框架的越轨，造成本身难言之苦、难堪之处。在这种情况下，报纸能反映多少人民性呢？有个叫弗朗西丝的文学作品，又拍成了电影，据说是根据在美国发生的真人真事创作拍摄的，其中描写那么一个有成就的女演员，因为违反了好莱坞

老板的意愿，受到了报纸、警察、法庭施予的各种打击和凌辱，还被诬强迫送进疯人院，遭到了医务人员勾结兵痞流氓分子的轮奸。她还不是主动去揭穿剥削阶级的本质和丑恶，只是不愿意俯首贴耳地去当剥削者的奴隶，就遭到了如此悲惨的结局。这些事实，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揭露出来的，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忍无可忍揭露出来的啊！自然，那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可能又偏杀一枪，说：“那边还是不错啊，产生了弗朗西丝这样好的作品！”他们是很会杀这种偏枪的：在理屈辞穷之下，就避开剥削阶级社会反人民的实质，把问题又扯到别的方面去了。他们故意不看到所谓弗朗西丝这个作品，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流萤而已，我们从来是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封建社会里，也有这样的流萤的。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不是也存在这样的流萤的么？

按照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报纸刊物应该对党对人民负责，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应以正面的宣传为主，要鼓励人民群众，要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的蓬勃发展。我们有时也揭露一些社会的阴暗面，我们揭露它是为了引起注意，引起警觉，使大家着力来纠正它和改变它。我们的党性原则与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有的人说，党是会犯错误的，而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所以他要用人民性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任何政党，包括无产阶级政党，自然都不可避免的会犯错误，问题在于无产阶级政党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说人民不会

犯错误，这却是糊涂观念，由于没有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由于因袭的影响，由于偏听偏信、偏执和某种过激情绪造成的偏颇，人民也是会犯错误的，这已经被中外历史和大量的实践所证明。问题还在于，人民是那么庞大的队伍，在我国有11亿以上，人民当中有受各种思想影响、支配的群众，从多数来看其思想还不能说会完全摆脱了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那么，谁来代表人民呢？我们的看法是，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毫无自己私利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它的原则性，它的熟谙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的洞察力，它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它的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代表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党如果发生了理论脱离实际，固然也会犯错误，但是我们的党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从而领导群众继续去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事业而奋斗。我们中国共产党也犯过一些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大规模的、延续时间较长的错误，但是纠正这些错误的，恰恰不是别人，不是什么神仙皇帝，而是我们党的忠诚的健康力量起来，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从而改变错误的路线，实行正确的路线。那种把党性与人民性分裂开来，对立起来，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证明是荒谬的。试问，如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由那个倡导人民性的报纸，或者所谓“民营”的报纸来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这个报纸又是由那一个或几个主持人操纵的，岂不是要把那一个或几个报纸主持人的主张，凌驾于党之上、人民之上，哪还有什么人民性，有什么人民群众的当

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呢？至于说到揭露错误，我们社会主义报纸刊物揭露错误，只是为了改正错误，而不是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报刊那样，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垄断集团的利益，去攻击那个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为了整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去欺骗、愚弄、把玩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报刊所效忠的有钱有势的办报人的利益，去造谣中伤、诽谤歪曲。至于有人夸口，说什么只要给了他可以不尊重党性原则，而按所谓人民性来自己决定事情，他就可以纠正类似“文革”那种错误。这真是一个天下奇谈。历史是一面镜子，试问，有那一个国家的那一个报刊，仅靠自己的力量，曾经纠正过统治阶级（无论那个统治阶级）的重大决策呢！什么都可以揭露么？这是在任何阶级统治的社会都做不到的。统治阶级只能够允许你在不危及它的阶级统治的原则下，给你一点活动的余地，给你一点“自由”，作为它那个社会“民主”“自由”的点缀。如果任你所为，它还要专政来做什么？！所谓“自由”，无非是资产阶级用以装饰它的阶级统治社会的花絮而已。那些故意不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提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社会形态的阶级专政，而谈所谓人性、人道主义、人民性之类的要超越一切原则的人，他的主谋者，其实并不是不懂得这些，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蛊惑人心，制造混乱，妄图达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以求得使他们自己爬上资产阶级统治的代理人的地位而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正确的标准。在1989年春夏之际，蓄意把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分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人受到了实践的检验。当时那些动乱“精英”们（自称“精英”，狂妄得何等不知羞耻二字。）不是曾经口口声声要代表

人民吗，可是他们在煽动、蛊惑一些幼稚的学子们起来反对代表自己利益的党和政府的同时，早就在国际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动势力的庇护下，把自己保护起来了：他们把幼稚的学子作为屏障，躲在那后面向党、向人民的政府、向中国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射击，不仅是政治上的造谣中伤，诽谤污蔑，进行陷害，而且掷出数不清的汽油瓶，纵火焚烧，残酷地殴打、杀害解放军，砸烂军车，而一旦人民政府忍无可忍，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前途和利益着手来平息那场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时，他们中的许多头面人物，则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动势力的护卫下，逃之夭夭，当白华去了。那些动乱和参与反革命暴乱的“精英”们，如果说以前他们进行破坏活动时其纲领还时明时暗，若明若现，偶现又掩的话，那么一当逃到了国际资本反动势力的卵翼下，他们的阴谋就变成了公开的宣言，要搞私有化，要搞多党制，要全面地搞资本主义。由此证明，我们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不是如过去他们为自己辩护、以逃脱责任时所说的是曲解了他们的讲话、报告、文章，而是抓得十分准的。这也完全活脱脱地暴露出了这些人是用阴谋的手段在与党、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进行斗争，其目的是在中国恢复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罪恶制度。而倡导党性与人民性分离、割裂、对立，倡导搞所谓“民营”报纸的人，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恰恰是充当了动乱、暴乱“精英”们的枪手。

有人说，有的党员违纪违法，甚至贪污受贿，走私贩私，失职渎职，严重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这些问题，在某个时期，在某一片地区，甚至形成一股风气。这种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要得到充分的揭露，报纸就应当站在“人民

性”方面，不受约束，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甚至必须要有“民营”的报纸，才能做到。这里，存在一个对党风形势的正确估计问题，存在一个党对不正之风所持的态度问题，还存在一个揭露的目的究竟何在的问题。还是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老话，革命的新闻工作者和文艺作家，有必要分清延安和西安。当前，应当说，我们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是在执行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的，是忠实积极地在建设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是勤勤恳恳地在为中国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工作的。经不起执政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而搞不正之风的人，实属少数，违法犯罪者则更少。不能因几只乌鸦展开翅膀，遮住了我们的眼睛，就说天下一片黑。诚然，党风不端正，产生了党内不正之风，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是不能容忍的。但是，我们的党中央，是坚持正确的路线，坚决地与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不过，这个斗争一定要进行得很稳，很准，很狠。“不怕跳得欢，就怕共产党拉清单”，仍然有用，但要防止伤害好人，伤及无辜，伤到那些真正想为党、为国家办好事，由于没有经验而偶有越轨的同志。有的人写文章，做报道，把那些并没有违纪违法问题，仅仅是某个犯罪分子找过他一下，填了一张会客单的人，也说成是什么与犯罪分子有勾结，说成是“天下老鸹一般黑”，用以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有的人，一方面进行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一方面又说他是反不正之风的，是反对腐败的。其实，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搞腐败，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提

出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把铺张浪费，讲究排场，拿红包、拿佣金、拿回扣作为问题来抓。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要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发展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它的各个政党，一般是不谈什么党风的；铺张浪费，讲究排场，拿红包、拿佣金、拿回扣，董事长要自己的小舅子当总经理、小姨子当总会计师，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敢管。国家毕竟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不管资产阶级国家蒙上了多少层五颜六色的伪装，仍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的国家，还有哪个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在那里，你反对什么不正之风？反什么腐败？诚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垄断集团之间，为了利益的争夺，有时也会演出一些反腐败的“廉政”的闹剧，煞似好看，但终结还是以这个集团的腐败，代替那个集团的腐败。岂止在资本主义制度，即在封建社会，慈禧太后不是也平反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案、惩治过贪赃枉法么？对问题不作阶级分析，什么也说不清道不明。实际上，共产党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最明显的不正之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要使部分的少量的腐败，演变成全面性的全社会的腐败。

当我们谈到共产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党性的时候，那是指的工人阶级最先进思想、最良好品质的集中体现：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工人阶级自己。所谓人民性是什么呢？在不同的时代，人民的内容是不同的，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影响下的人民的要求、愿望、取向也是不同的，姑且理解为不同时代劳动人民的最大多数的一种共同的要求、愿望、取向和



利益所在吧。但是，在封建社会，作为劳动人民主体的农民是想有个好皇帝，有个包青天，其实还是脱离不开封建观念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前期，资产阶级处于兴旺发展的时期，劳动人民的主体其实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口号的，只是后来他们认清了那些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原来是把他们从绳索的捆绑下解开来，又把他们用铁链捆绑在机器上，才发生了砸机器、烧厂房的斗争；真正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只能是人类社会全部科学的结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又将这个革命的科学交到工人和劳动人民手中，成为他们为剥削阶级掘墓的工具，成为他们绝大多数人的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武器。共产党的党性，体现了最广大、最丰富、最有前途的人民性和人民的利益。当党犯错误的时候，人民固然会受到一些伤害，但受到伤害最直接、最大的首先是党，因此党必然会倾全力纠正错误，恢复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达到党性的纯洁、党风的端正。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的、社会主义的报刊、通讯社，不是积极地提出并力促党性的纯洁，党风的端正，党纪的严明，而是提出什么党性与人民性的分裂、割裂、对立、斗争，妄图用自己掌握的宣传手段来与党相抗衡，甚至要办所谓“民营”报纸来与党斗争，这条道路是很危险的。当然，对党提意见，也有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非要把你个人的、几个人的意见都说成是正确的意见，要强加于党，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则是既违反党内民主，也违反正确的集中的。

1991年6月30日